

宗教政党对以色列政局及阿以冲突的影响

冯基华

内容提要 犹太教是以色列国教，大部分犹太人都不同程度地信仰犹太教。宗教政党得到正统派犹太教徒及部分宗教色彩较浓重的东方犹太人的支持，他们的支持者总体来说比较稳定，在历届政府中所占席位变化不大，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是各执政党在组阁中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在政府制定内外政策时，宗教政党经常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尤其在制定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时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 以色列 宗教 政党 政策 阿拉伯 冲突

作者简介 冯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7）。

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自有文字记载起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代以色列曾有过鼎盛时期。随着犹太圣殿的被毁、犹太王国的衰落，以及犹太人的大流散，犹太教成为犹太民族的精神。因此，犹太民族虽历经磨难，分散于世界各地，却保持着民族的特性。以色列建国后，随着犹太人在以色列的比例日益增加，犹太教已处于国教地位。尽管犹太复国主义鼻祖西奥多·赫茨尔设想的以色列国是一个世俗国家，但它一直受到宗教力量的严重干预。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的民主体制，特别是议会选举采取的比例代表制，给犹太宗教势力提供了成为政治力量的机会，以及超出其实际力量的发言权；犹太教的政治代表——宗教政党凭借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对阿拉伯国家政策和阿以关系构成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宗教政治势力必然对以色列产生影响。

以色列政体为 宗教势力参政创造机遇

以色列是议会民主制国家，基于三权分立

的原则，国家机构由三部分组成：立法机构（议会）¹、行政机构（政府）和司法机构（法院）。政府需要得到议会的信任，而法律则保证司法机构的绝对独立，这种相互制约的机制保证了以色列政治结构的平衡。

在以色列政体下，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只具有国家代表的象征性意义，其职责大都属于礼仪性质，不掌握、也不行使任何重大的和实质性的政治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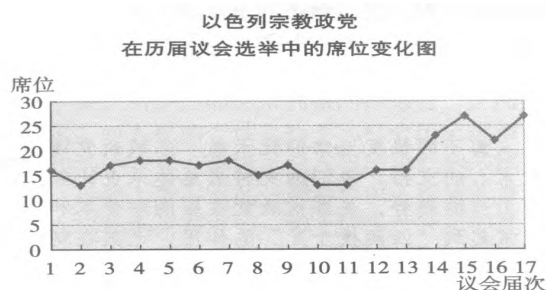
议会的职能是立法和监督政府工作，向议会提交的议案经“三读”及议员简单多数投票赞成即可通过；任何党派均可向议会提交对政府的不信任案，一旦在议会通过，便可使政府倒台。

议会选举采取比例代表制。1951年以色列通过《议会选举法》，其主要内容一是规定任何政党只要在全民投票中获得总票数的1%（1992年提高为1.5%），便可进入议会；二是根据各党派在全部选票中的比例分配议席。这种比例代表制一方面导致以色列政坛党派林立，且分化组合频繁；另一方面，也给宗教政党跻身政治舞台

¹ 希伯来语中称为“克奈塞特”（Knesset）。

创造了机会。在以色列，正统派犹太教徒和部分处于社会下层的东方犹太人是宗教政党的忠实选民，其数量及投票倾向都相对稳定。所以每次举行选举后，各宗教政党都能在议会中获得一定数量的席位，从而成为以色列政坛上一支稳定的政治力量。

以色列宗教政党
在历届议会选举中的席位变化图



资料来源：以色列议会网站资料，[Http// www. kneset. gov. il](http://www.knesset.gov.il)

政府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拥有对本国一切重大事务的决策权。政府须得到议会信任，即在议会 120 名议员中获得超过半数议员（至少有 61 名议员）的支持，政府才能成立。反之，一旦支持政府的议员数量不能满足这个“基数”，政府将面临倒台的危险。近年来以色列的基本政治格局是：议会议席分布过于分散，工党和利库德集团均从未能获得议会 50% 以上的席位，无力单独组阁，必须争取其他小党的支持，组成多党联合政府。这就导致一些小党在政府中的作用大大超出其实际力量，它们甚至以退出政府相要挟，制约政府的决策。

由于宗教政党的政治、经济、宗教纲领及在议会所占席位都相对稳定，其政治要求较之其他世俗政党也容易满足，以色列历届政府（工党执政、利库德集团执政或两大党派集团联合执政）一般都愿意吸纳宗教政党为成员。加之近年来宗教政党的势力不断上升，使其有能力且有机会直接干预政治，甚至在两大集团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之时起到“四两拨千斤”的特殊作用。

主要宗教政党 及其政治主张

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宗教政党在以色列就已

存在，均属犹太教正统派，主要分为正教运动和精神中心运动两大体系。前者包括以色列正教党和以色列正教工人党，原则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后者包括精神中心党和精神中心工人党，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宗教政党自成立以来经过长期分化组合，形成当前的“三足鼎立”之势：即属于正教运动体系的沙斯党、圣经联合阵线和属于精神中心体系的全国宗教党。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这三大宗教政党的作用和影响最为明显。

沙斯党 (SHAS)：全称“塞法拉迪圣经保卫者联盟”，是 1984 年从以色列正教党分裂出来的一个非犹太复国主义的、正统教派的、塞法拉迪人的政党，在第 11 届议会大选中，沙斯党不仅赢得以色列正教党的部分选民，还吸引了泰米党选民，一举成功而获得 4 席。该党因注重发展公众社会福利和教育事业，深得处于社会底层的东方犹太人的拥护和支持，并在以后的大选中得票数直线上升。1984~1998 年一直参加联合政府，在 1999 年大选中获 17 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三大党，并参加工党执政联盟。在今年大选中，沙斯党获得 12 个席位，与利库德集团并列为第三大党。沙斯党的最高精神领导机构是“圣经贤哲委员会”，精神领袖是塞法拉迪犹太大拉比奥瓦迪阿·约瑟夫，现任主席为埃利·伊沙依 (Eli YISHAI)。

沙斯党主要关心本党及其选民在宗教、社会及经济方面的利益，在以巴冲突等问题上立场较温和、灵活。在宗教上持正统派立场。该党十分重视发展宗教教育体系，屡次就教育经费问题向政府发难，引发内阁危机。

全国宗教党 (NATIONAL RELIGIOUS PARTY)：宗教复国主义政党，由精神中心党和精神中心工人党于 1956 年合并而成。无论是与工党合作，还是与利库德集团合作，该党几乎一直是历届联合政府的成员，只是在 1958 年和 1959 年由于在“谁是犹太人”问题上的分歧，曾退出内阁。该党在 1992 年第 13 届议会选举中获 4 席，但未加入以拉宾为首的工党政府，作为反对党和利库德集团一起不断对工党左翼执政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在 1996 年第 14 届议会选举中获 9 席，加入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在 1999 年第 15 届

议会选举中获 5 席，加入巴拉克政府。2003 年在议会选举中赢得 6 个议席，参加联合政府，并在内阁中获得 2 个职位。在今年的议会选举中赢得 9 个议席。现任主席埃菲·埃坦姆 (Effie Eitam)。

全国宗教党政治立场强硬，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反对任何领土让步和拆除犹太定居点，支持修建隔离墙。在国家与宗教关系问题上，全国宗教党的目标是：要求以色列国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以色列社会成为民族的宗教社会。在具体宗教事务方面，虽然也主张按照犹太教律法治国，但较沙斯党态度温和。

圣经联合阵线 (UNITED TORAH JUDAISM)：继沙斯党从以色列正教党分离出去后，正教党中的立陶宛派因与哈西德派不和，也于 1988 年另立山头，成立了“圣经旗帜党”。1992 年以色列第 13 届议会选举前，以色列正教党、正教工人党与圣经旗帜党合并，成立了圣经联合阵线。领导人是梅尔·珀拉斯 (Meir Porush)。该党在 1992 年第 13 届议会选举中获 4 席，未加入拉宾政府；1996 年第 14 届议会选举中获 4 席，加入内塔尼亚胡政府；1999 年第 15 届议会选举中获 5 席，加入巴拉克政府。2001 年 3 月，经一番讨价还价，该党最终加入了沙龙领导的联合政府。在 2003 年大选中获 5 席，今年大选中获 6 席。

圣经联合阵线愿意在宗教和国家事务上维持现状，出于经济、社会和安全方面的原因，支持加快在全以色列境内的定居点建设；对阿以问题的立场较为强硬，反对同巴勒斯坦谈判，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巴拉克上台后不久，于 1999 年 9 月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圣经联合阵线对此表示强烈抗议，并随即退出巴拉克政府。

宗教政党对政府更迭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一) 由宗教问题引发的冲突背后，都隐藏着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凡是以维护宗教信仰面目出现的社会或政治活动，都是一定利益集团使然，其背后总是隐藏着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

益。¹ 以色列宗教政党与政府及其他党派争执的目的，大多为了争取本党及选民的利益。沙斯党因其经营的宗教学校经费不足，极力争取增加教育拨款；全国宗教党选民乃至议员很多是定居者，故在领土问题上态度强硬。围绕宗教问题的争执往往引发内阁危机，造成政局不稳。据统计，1949~1979 年共发生了 106 次内阁危机。其中因宗教问题引发的危机就有 35 次，几乎占了 1/3。^④

(二) 围绕宗教问题进行的斗争甚至可直接导致政府倒台

1976 年底，时任总理拉宾在某空军基地举行仪式，迎接一批新型美式战斗机。因恰逢安息日，宗教政党以亵渎安息日为由在议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迫使拉宾政府辞职。由此可以看出，宗教政党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可小视。事实上，自 1992 年以来，随着宗教政党势力的不断上升，拉宾、内塔尼亚胡、巴拉克和沙龙等领导的几届政府在制定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大都受到宗教政党的牵制。

1993 年 6 月，梅雷兹党主席、时任教育部长的舒拉米特·阿洛尼谴责宗教干预社会生活，引起沙斯党强烈不满。沙斯党以退出联合政府相要挟，威逼总理拉宾撤消阿洛尼的教育部长之职。当时拉宾政府在议会中所占席位为 62 席，若拥有 6 个议席的沙斯党退出，拉宾政府将面临倒台的危险，而以阿洛尼为首的梅雷兹党则是工党的忠实支持者。拉宾在两难之间权衡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劝说”阿洛尼辞去教育部长的职位，以保证政府继续推行和平政策。

(三) 内塔尼亚胡上、下台与宗教政党有关

1996 年年中内塔尼亚胡在参加总理竞选时，犹太教界正统派德高望重的拉扎尔·沙赫大拉比号召正统派教徒投内氏的票，为内氏最终以微弱优势战胜工党元老佩雷斯助了一臂之力。1998 年 10 月，内塔尼亚胡政府在与巴方签署关于以军撤出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怀伊协议》后，受到来自以全国宗教党为代表的右翼势力的沉重

¹ 参见金宜久、吴云贵著：《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1 页。

^④ 参见阎瑞松主编：《以色列政治》，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8 页。

压力,被迫中止执行此协议,并最终导致议会解散,提前举行大选,内氏在总理选举中落败。

(四) 巴拉克政府受到宗教政党严重掣肘

沙斯党和梅雷兹党在宗教问题上素有龃龉,巴拉克政府上台后,沙斯党因其经营的宗教学校连年亏损,一再要求教育部向该党增拨教育经费,遭到梅雷兹党领导人——教育部长萨里德断然拒绝。沙斯党对巴拉克在解决教育经费问题上没有向萨里德施压心怀不满。与此同时,全国宗教党坚决反对巴拉克政府将耶路撒冷附近的巴勒斯坦村庄移交给巴勒斯坦,以及将戈兰高地归还叙利亚的政策。两党为实现各自的利益和目标,都伺机向巴拉克发难。2000年6月7日,反对党利库德集团向议会提交了“解散议会提前选举”的议案。虽然巴拉克在投票前发出警告,身为内阁部长的议员若对议案投赞成票等于辞职,但联合政府中沙斯党的17名议员和全国宗教党的5名议员还是全部投了赞成票,使议案得以在议会预读通过。巴拉克政府陷入严重危机,不得不对两个宗教政党进行“安抚”,一方面答应为沙斯党增拨教育经费;另一方面“暂缓”履行与巴勒斯坦签署的有关协议(从约旦河西岸撤军的行动)。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7月,就在巴拉克与阿拉法特、克林顿举行戴维营三方首脑会晤期间,全国宗教党和沙斯党指责巴拉克“将出卖国家和犹太定居者的利益”,反对巴拉克在会晤中承诺向巴勒斯坦归还更多的领土,与移民中的以色列党相继退出联合政府,使巴拉克政府在议会中的席位由68席降至42席。2000年12月11日,巴拉克宣布辞去总理职务后,利库德集团借机提出解散议会、并重新举行议会选举的议案。沙斯党因担心在新的议会选举中将失去一些席位,经该党圣经贤哲委员会决定,勒令该党17名议员对利库德集团的提案投反对票,使议案未获得通过,导致新的议会选举落空。随后,沙斯党的“利己主义”又为沙龙上台作了铺路石。

(五) 沙龙政府中宗教政党的地位举足轻重

2001年3月,沙斯党和圣经联合阵线以“高要价”加入以沙龙为首的联合政府。沙斯党凭借其议会第三大党的有利地位,独揽内政部、宗教事务部、劳动及社会事务部、耶路撒冷事务部及卫生部等5个部长职务,权力范围明显扩

大。沙斯党不失时机地利用其在政府中的权势为本党谋利益。2001年12月上旬,沙斯党的宗教事务部长阿什尔·奥哈纳警告说,如果政府不在2002年财政预算中增加对宗教事务部及宗教学校的拨款,沙斯党将投票反对预算案。¹

2004年6月沙龙提出单边行动计划,遭到利库德集团内部右翼势力及宗教政党的反对,全国宗教党因此退出沙龙政府,使沙龙政府在议会中的席位降至55席。12月1日沙龙政府提交2005年度财政预算案,在议会一读中没有通过。根据以色列法律,如果议会不能在次年3月31日前通过三读,沙龙将不得不解散政府,提前举行大选。其实,沙龙政府预算案危机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单边行动计划。尽管沙龙在议会一读前向正统宗教党派圣经联合阵线拨款2.9亿新谢克尔,还许诺向全国宗教党等右翼宗教党派拨款,全国宗教党和沙斯党依然投票反对,原因是这些右翼宗教党派反对沙龙倡导的单边行动计划,希望借预算案危机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放弃这一计划。沙龙的做法遭到宗教改革派变革党的反对,使其在一读中投了反对票。为保证单边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沙龙解除了变革党内阁部长职务,极力拉拢工党入阁。为平衡内阁中的左右翼势力,沙龙还邀请极端宗教党派圣经联合阵线入阁,组成新的联合政府,度过危机。

宗教政党

对阿以冲突的影响

宗教政党在阿以冲突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在当今的以色列,世俗政党仍占主导地位,但它们在制定对阿以冲突的政策时,不能不考虑宗教政党的态度。

以色列宗教政党对阿以冲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被占领土问题上。1967年“六五”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加沙地带、包括耶路撒冷东城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西奈半岛。这场战争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以色列的安全地位。在以色列犹太人看来,这是一场“结束

¹ See “Shas Demands More Money For Yeshivot”, *The Jerusalem Post*, December 12, 2001.

所有战争的战争”，它既彻底摧毁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及自信心，也大大增加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缔结和约及解决边界问题的筹码。然而，阿拉伯方面无意与以色列全面媾和，且在各条战线上同以色列占领者展开斗争，被占领土问题成为以色列国家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如何处理被占领土问题成为以色列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

围绕这一重大问题，以色列政界分化为两大主要派别：持强硬立场的“鹰派”与持温和立场的“鸽派”。各主要宗教政党也都无一例外地卷入这场争论的旋涡。出于犹太教根深蒂固的“应许之地”理念，以及定居运动给宗教政党支持者带来的“切身利益”，大多数宗教政党在被占领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属“鹰派”阵营。全国宗教党主张兼并被占领土，并支持犹太人在所有被占领土上定居。早期的以色列正教党和以色列正教工人党，以及后来的圣经联合阵线则完全从宗教的角度来论证以色列对被占领土拥有“天经地义”的合法权利，坚决反对在领土问题上实行任何妥协。沙斯党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较为温和，但常常借政府制定对阿拉伯国家政策之机提高要价，以满足本党在宗教方面的利益。

无论是在工党，还是在利库德集团执政时期，每当政府在被占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决策之际，宗教政党就会向政府施压，在不同程度上对阿以冲突及阿以和谈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

1993年以巴签署《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即《奥斯陆协议》），标志着阿以冲突进入和平解决阶段。我们以此为界，解析宗教政党对阿以冲突和阿以和谈的影响。

（一）《奥斯陆协议》签署前宗教政党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的影响（1967~1993年）

这一阶段，宗教政党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宗教政党内的激进派积极投身于定居运动。1968年全国宗教党加盟工党政府，然而，一伙激进的神学院阿什肯纳兹正统派犹太教学生在党内选举中获得了20%的选票。这股势力与党内元老派进行激烈斗争并占据上风，最终迫使该党放弃了在被占领土问题上准备向工党妥协的

立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这伙激进派认为：由于政府在领土问题上态度暧昧，给阿拉伯国家袭击以色列以可乘之机。为此，他们不断公开发泄对该党领导人的不满。迫于压力，全国宗教党领导人司法部长布尔格以“致西岸定居者一封信”的形式发表声明，表示该党不会接受任何放弃“大以色列”的主张，并将采取措施支持犹太人在“被解放的以色列地”定居。与此同时，该声明还承诺建立一个部长级委员会，筹划和实施广泛的城乡定居活动，并敦促政府将主权扩大到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1974年2月，这伙激进派青年与全国宗教党分道扬镳后，伙同一些被占领土的定居者（包括党外人士）正式成立了“信仰者集团”。该组织以维护被占领土为目标，以从事定居活动为主要手段，想方设法促使政府制定在被占领土实施全面定居的计划。尽管该组织在约旦河西岸建立非法定居点的活动在工党执政时期受到政府的限制（仅1974~1975年在约旦河西岸建立了为数很少的定居点），但在1977年利库德集团领袖贝京上台伊始，该组织关于在约旦河西岸建立60个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就获得批准。该组织也因此成为利库德集团执政后推行和实施定居计划的核心力量。“信仰者集团”还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扩建定居点策略。截至1989年，由该组织建立的犹太人定居点已占约旦河西岸领土的1/9，总计31.3万公顷。¹难怪有人说，自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以来，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首次成为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重要力量。^④

2. 全国宗教党靠施压迫使政府执行扩大定居点的政策。全国宗教党还通过施压迫使政府执行扩大定居点政策。1978年底，全国宗教党领导人教育部长泽布隆·哈默以该党将退出政府相要挟，要求贝京政府以书面形式保证实行大规模定居政策。当时参加贝京政府的各党派在议会中只拥有64席，其中全国宗教党就占12席。^④若该党退出，贝京政府将失去议会多数而面临垮

¹ 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2页。

^④ [美国] 查尔斯·利伯曼、埃利泽尔·唐·耶海亚著：《以色列的宗教和政治》，布卢明顿1984年版，第1页。

^④ 参见阎瑞松主编：前引书，第284~289页。

台的危险。迫于全国宗教党的压力, 贝京于 1979 年 1 月向全国宗教党提交了由他亲笔签署的保证书, 宣布在约旦河西岸新建 6 个犹太人定居点。1979 年 10 月, 以色列最高法院将位于约旦河西岸的阿隆莫定居点裁定为非法定居点。为此, 全国宗教党向政府发出警告: 除非将以色列领土主权扩大至整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使任何形式的犹太人定居点都成为合法, 否则该党将退出政府。经过讨价还价, 全国宗教党同意留在政府内, 条件是贝京政府许诺在约旦河西岸新建 31 个定居点, 使那里的犹太居民增加 3 倍。¹

另外, 宗教政党还对“大以色列计划”推波助澜。1981 年 8 月, 利库德集团赢得第十届议会选举, 贝京与全国宗教党、以色列正教党、泰米党组成联合政府。三大宗教政党的加盟促使第二届贝京政府在被占领土问题上奉行更为强硬的政策, “大以色列计划”应运而生。该计划主要包括 3 项内容: 一是吞并戈兰高地; 二是加紧实施定居点政策; 三是发动黎巴嫩战争。毋庸置疑, 这一计划的实施加剧了阿以冲突。

(二)《奥斯陆协议》签署后宗教政党对阿以和谈的影响 (1993 年至今)

这一阶段, 以色列宗教政党对阿以和谈的影响在内塔尼亚胡和巴拉克两届政府中有突出的体现。

1. 内塔尼亚胡执政时期 1996 年上台的内塔尼亚胡政府在议会中拥有 66 席, 其中 3 个宗教政党就占 23 席, 在政府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宗教政党对阿以和谈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作用。

沙斯党对推动签署以巴和平协议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97 年 1 月, 内塔尼亚胡被迫满足了沙斯党关于增加对宗教学校教育拨款和提高专业犹太教教士生活补贴的要求, 从而赢得该党对以巴签署《希伯伦协议》的支持, 使协议得以在议会获得通过。1998 年 10 月以巴签署《怀伊协议》后, 沙斯党的支持为协议在议会获得通过也起了重要作用。

全国宗教党和圣经联合阵线则阻挠中东和平进程。1997 年 3 月, 迫于全国宗教党和圣经联

合阵线的压力, 内塔尼亚胡政府决定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霍马山兴建犹太人定居点, 遭到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 导致以巴和谈久陷僵局。

2. 巴拉克执政时期 1999 年 5 月, 工党主席巴拉克战胜内塔尼亚胡出任总理。巴拉克组成的联合政府吸纳了拥有 27 个议席的 3 个宗教政党, 这些宗教政党对巴拉克的和平政策产生了消极影响。1999 年 6 月 14 日, 为拉拢全国宗教党入阁, 当选总理巴拉克与全国宗教党达成口头协议, 许诺他领导的联合政府将支持在东耶路撒冷的霍马山和马莱·阿杜米姆等地继续扩建犹太人定居点。2000 年 5 月 15 日, 以色列内阁以 15 票对 6 票通过一项计划, 同意将耶路撒冷附近的两个阿拉伯村庄——阿布迪斯和阿扎利亚交由巴勒斯坦人全面管理。^④全国宗教党坚决反对, 认为这会破坏以色列对整个耶路撒冷的控制, 并表示如果这一决定付诸实施, 该党将退出政府。迫于压力, 关于移交上述两个村庄的决定未能实施。

可见, 尽管三大宗教政党对阿以冲突的态度各有不同, 但都通过退出政府等方式向政府施压, 从而对政府的对阿拉伯国家政策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 尽管以色列是一个世俗国家, 实行议会民主制, 但由于实际上处于国教地位的犹太教对犹太人根深蒂固的影响, 使宗教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以色列政府的稳定和内外政策的实施, 对未来以色列民主政治的发展和中东和平进程也将产生严重掣肘。世俗政党与宗教政党之间的斗争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期。然而, 在相对漫长的时期里, 宗教政党在以色列政治生活中很难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笔者认为, 政教分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止这一趋势向前发展。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邢永平)

¹ 杨灏城、朱克柔主编:《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俗》,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46 页。

^④ See <http://www.chinanews.com>, May 16, 2000.